

國學精粹叢書 80

儒家經傳文化 與史記

陳桐生◎著

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儒家經傳文化與史記

陳桐生◎著

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儒家經傳文化與史記／陳桐生著，--初版.--臺北市：洪葉文化，
2002[民91] 面；公分

ISBN 957-0420-56-1

1. 史記 - 研究與考訂 2. 儒家

610.11

91011145

儒家經傳文化與史記

作者／陳桐生
執行編輯／連茹萍
封面設計／張淑慧

發行人／薛慶意

發行所／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登記號：局版台業字第 5509 號

地址：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22 號 3 樓

電話：(886 2) 2363-2866

傳真：(886 2) 2363-2274

劃撥：1630104-7 洪有道帳戶

門市部／電話：(886-2) 2736-2544

版次／2002 年 9 月初版一刷

ISBN／957-0420-56-1

定價 500 元

◎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請寄回更換

引 論

從上古到秦漢時代，中華民族文化學術發展大趨勢是從學術統一走向分化，再由分化而走向整合。上古三代時期道一風同，帝王不僅是政治領袖，同時也是學術思想的創造者和發佈者。按照後來儒家的闡釋，五經就是上古三代王道思想的載體。戰國時期中華學術經歷了「道術為天下裂」¹的過程，在傳統的經學之外又產生了子學。由於中國早期社會學術統一的傳統的巨大影響，戰國秦漢之際的人們卻視百家爭鳴眾天下為最大的不幸，想方設法要結束百家言治、庶人議政的局面。因此從戰國後期開始到漢初，文化學術界就有意識地對分裂的思想學術進行整合，《荀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、賈誼《新書》、《淮南子》及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都程度不同地做了這方面的工作。但是對此前學術進行規模最大、最全面、最系統整合的還是司馬遷的《史記》。

對《史記》這部文化巨著，今天的人們多從文學或史學角度解讀。但從司馬談、司馬遷父子來說，他們的著眼點可能更多地是放在學術方面。還在剛剛開始著手《史記》著述的時候，司馬氏父子就將自己的史書定位在上繼孔子《春秋》之上。²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一則載司馬談遺囑：「孔子修舊起廢，論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作《春秋》，則學者至今則之。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，

¹ 《莊子·天下》。

² 戰國儒家提出孔子作《春秋》之說，後人對這一說法提出不少疑問，下文對此另有討論。

而諸侯相兼，史記放絕。今漢興，海內一統，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，余爲太史而弗論載，廢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懼焉，汝其念哉！」再則載司馬遷之語：「先人有言：『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，正《易傳》，繼《春秋》，本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之際？』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讓焉。」司馬氏父子的宏願是要通過著述《太史公書》，來繼承孔子刪述六經的偉大事業，³ 特別上繼孔子的《春秋》。司馬遷時代的《春秋》居五經之首，它以「長於治人」⁴ 而著稱，是漢武政治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，其地位相當於今天的一部國家憲法。司馬氏父子矢志著史上繼孔子《春秋》，做孔子第二，實質上是要繼承孔子以學術思想指導政治的精神。按照當時儒家的說法，《春秋》的學術思想寄託在述史過程之中。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載孔子曰：「我欲載之空言，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」這裏所說的「行事」，是指具體的歷史事件。孔子說他之所以不採取「空言」亦即空發議論的形式，乃是因爲他覺得通過褒貶具體的歷史事件來表達學術思想，要比「空言」議論更爲深切和明確。《春秋》所載的史事是「表」，蘊含在史事之後的學術思想是「裏」，而孔子的落腳點是放在「裏」即學術思想之上。孔子「見之於行事」的表達方式也被司馬氏父子完全繼承下來，他們在記述中國幾千年通史過程中寄寓了豐富的學術思想，以此對此前的文化學術進行整合。我們是否可以說，在《史記》中存在著兩套語言：一套是史學語言，在史學語言之後還蘊含著一套學術語言？

³ 孔子刪除六經說是戰國儒家在重新塑造孔子形象過程中提出來的，除孔子正樂之外，其他說法都還存在不少問題。

⁴ 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。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將《太史公書》繫於六藝略《春秋》類，這個處理深得司馬氏父子的本心。

不過，司馬氏父子的生活環境與學術背景與孔子不盡相同。孔子生活在王室衰微、諸侯力政、王道文化傳統中斷的春秋末年，所以孔子採取刪述六經的方式來申明王道。也就是說，孔子當時的學術使命是撥亂反正，是捍衛傳統文化學術的價值。司馬遷時代政治統一，不再有孔子當年那種王綱紊亂諸侯兼併的憂慮，但是在學術戰線上所面臨的任務要更為複雜：漢武帝只是通過行政強制手段廢黜六經之外的諸子學說，而未能將諸子百家的精華加以合適的整理和吸收，即使就經學而言也存在著六經異傳眾說紛紜的情形。對此前文化學術思想進行全面分析、選擇、揚棄、整合，是司馬氏父子所肩負的學術重任。早在建元初年，司馬談就寫下了那篇著名的哲學論文《論六家要指》，他認為天下百慮一致殊途同歸，六家都是言治，只不過論述的角度和途徑不同而已。司馬談在文章中分析了六家學說的長短優劣，主張對諸子百家捨短取長。《論六家要指》篇幅很短，而且是採用「空言」方式，未能「見之於行事」。司馬談整合文化學術的宏願是由其子完成的，司馬遷十分明確自己的學術使命，他在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中將《史記》的學術宗旨概括為「厥協六經異傳，整齊百家雜語」，就是說要將此前分裂、對立、矛盾和歧異的六經異傳和百家雜語整合成一個學術思想體系。

從《史記》來看，司馬遷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學術使命。司馬遷所整合的學術對象包括經學和子學兩大陣營，《史記》所引述的典籍不下百種，《史記》所吸收的經學和子學的學術觀點更是無比豐富，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，《史記》是吸收此前學術理論最多的著作，它堪稱中華民族文化學術的百科全

書，司馬遷不愧是中國的文化崑崙。特別需要強調的是，司馬遷面對如此眾多的學術內容沒有茫然無緒，《史記》對此前文化學術的整合也不是一個龐雜的大拼盤。在《史記》所吸收的諸多學術觀點中，有一個核心觀點，這就是孔子作《春秋》。如果我們將《史記》與經子典籍關係進行最大程度的約簡，約到最後就是《史記》與《春秋》的關係；如果將司馬遷與此前思想家的學術關係進行最大程度的約簡，約到最後就是司馬遷與孔子的關係。司馬遷是將孔子作《春秋》視為劃時代的歷史事件，他是在孔子的旗幟之下對六經異傳進行整合，並將戰國秦漢的學術活動看作是孔子事業的繼承和發展，由此而形成《史記》以孔子為樞紐的文化學術史觀。

這本書所討論的就是《史記》「厥協六經異傳」問題。《史記》絕大部分篇章都取材於六經異傳，《史記》對許多歷史事件的評價也來自儒家經傳，更為重要的是《史記》從六經異傳中吸收了若干重大學術思想。司馬遷時代的經學分為今文和古文，《史記》所吸取的經說也包括今古文兩派。在今古文經學中，《史記》是以今文經學為主。在今文五經之中，《史記》是以吸取《春秋》經說為主。在《春秋》三傳之中，《史記》是以採用春秋公羊學為主。在治春秋公羊學的董仲舒、胡毋生、公孫弘三家之中，《史記》是以董氏公羊學為主。在董氏公羊學諸多要義之中，《史記》是以董仲舒的「更化」學說——按照孔子《春秋》的一王之法建立漢家制度——為主。從學術思想來看，《史記》吸收了以春秋公羊學為代表的漢初今文經學的革命精神，傳達了當時思想精英改革社會的激情，體現了當時朝野上下對於建立理想政治局面的美好願望。

就讓我們從司馬遷最為重視的春秋公羊學的核心觀點——孔子作《春秋》——寫起。

目 錄

引 論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《史記》與《春秋》（上） | 1 |
| | 一、孔子作《春秋》：《史記》的理論基石..... | 1 |
| | 二、孔子作《春秋》說的歷史文化考察..... | 4 |
| | 三、漢初今文經學的精髓..... | 27 |
| | 四、今文經學與司馬遷人生追求..... | 38 |
| 第二章 | 《史記》與《春秋》（中） | 43 |
| | 一、司馬遷述公羊義..... | 43 |
| | 二、孔子獲麟為受命之符說..... | 51 |
| | 三、孔子作《春秋》當一王之法說..... | 55 |
| | 四、《春秋》大一統說..... | 62 |
| | 五、經權說..... | 83 |
| | 六、慎始審微說..... | 92 |
| | 七、德治說..... | 98 |
| | 八、推刃復仇說..... | 118 |
| | 九、紀異而說不書說..... | 127 |
| | 十、君臣綱常說..... | 136 |
| | 十一、《史記》述《穀梁傳》經說..... | 143 |
| 第三章 | 《史記》與《春秋》（下） | 148 |
| | 一、《史記》述古文《左傳》經義舉例..... | 149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二、民本說..... | 163 |
| 三、《左傳》中的史官言行風範..... | 170 |
| 四、《史記》取三傳經說舉例..... | 174 |
| 第四章 《史記》與《周易》 | 176 |
| 一、關於孔子作《易傳》..... | 177 |
| 二、《史記》論《周易》幽明之術..... | 183 |
| 三、《史記》中的《易》說..... | 188 |
| 四、《易傳》與《史記》的宇宙觀..... | 192 |
| 五、《易傳》與《史記》的通變論..... | 206 |
| 六、《易傳》與《史記》的政治倫理觀..... | 222 |
| 七、《易傳》與《史記》的人生觀..... | 226 |
| 八、《易傳》與《史記》的學術觀..... | 234 |
| 九、《易傳》與《史記》的重時觀念..... | 240 |
| 十、《易傳》與《史記》的審微思想..... | 245 |
| 十一、《易傳》與《史記》的謙退觀念..... | 247 |
| 十二、《易傳》與《史記》之名小旨大..... | 254 |
| 第五章 《史記》與《尚書》 | 258 |
| 一、《史記》所引《尚書》篇目..... | 260 |
| 二、《史記》中的今文《尚書》經說舉例..... | 263 |
| 三、《史記》中的古文《尚書》經說舉例..... | 275 |
| 四、《史記》與《書序》..... | 279 |
| 五、《尚書》政治觀的垂示..... | 294 |
| 六、《堯典》與《史記》..... | 302 |
| 七、《洪範》與《史記》..... | 313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六章 | 《史記》與《詩經》 | 318 |
| | 一、《史記》述《魯詩》說舉例 | 319 |
| | 二、論孔子刪《詩》說 | 324 |
| | 三、論「四始」 | 336 |
| | 四、《關雎》、《鹿鳴》與風雅正變 | 357 |
| | 五、《商頌》寫作年代辨 | 372 |
| | 六、論聖人無父感天而生說 | 397 |
| | 七、論《詩》學的見盛觀衰 | 401 |
| | 八、論《史記》取材於《詩》 | 407 |
| | 九、司馬遷的《詩》學批評觀 | 417 |
| | 十、《史記》與《韓詩外傳》 | 456 |
| 第七章 | 《史記》與「三禮」 | 461 |
| | 一、司馬遷為何重視「三禮」 | 461 |
| | 二、司馬遷所見到的「三禮」讀本 | 466 |
| | 三、《史記》從「三禮」取材 | 471 |
| | 四、《史記》今古文禮說舉隅 | 477 |
| | 五、論《史記·禮書》與《樂書》 | 482 |
| | 六、禮學對司馬氏父子人格的培育 | 490 |
| | 七、《禮記·禮運》與《史記》禮讓精神 | 502 |
| | 八、司馬遷與禮學精神 | 508 |
| | 九、《史記》與《孝經》 | 519 |
| | 結束語：簡論《史記》「厥協六經異傳」 | 523 |
| | 後記 | 528 |

第一章 《史記》與《春秋》

(上)

一、孔子作《春秋》：《史記》的理論基石

《史記》一書從六經異傳和諸子百家著作中吸取了許多學術觀點。在司馬遷所吸收的這些學術觀點中，如果要找出一個最重要、最關鍵的堪稱靈魂性的觀點，那麼這個觀點就是儒家特別是春秋公羊學派所大力宣傳的孔子作《春秋》說。¹ 孔子作《春秋》說是一部《史記》學術思想的理論基石。

孔子作《春秋》說，見於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

子曰：「弗乎弗乎，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。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？」乃因史記作《春秋》，上至隱公，下訖哀公十四年，十二公。據魯，親周，故殷，運之三代。約其文辭而指博。故吳楚之君自稱王，而《春秋》貶之曰「子」；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，而《春秋》諱之曰「天王狩於河陽」；推此類以繩當世。貶損之義，後有王者舉而開之。《春秋》之義行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。孔子在位聽訟，文辭有可與人共者，弗獨有也。至

¹ 「春秋」本是各國史書的通名，自戰國儒家說孔子作《春秋》之後，《春秋》一書就專指春秋時期魯國史書。

於為《春秋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。弟子受《春秋》，孔子曰：「後世知丘者以《春秋》，而罪丘者亦以《春秋》。」²

在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中，司馬遷在敘述了王室衰微、諸侯力政後說：

是以孔子明王道，干七十餘君，莫能用，故西觀周室，論史記舊聞，興於魯而次《春秋》，上記隱，下至哀之獲麟，約其辭文，去其煩重，以制義法，王道備，人事決。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，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。³

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也說：

世以混濁莫能用，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，曰：「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矣。」西狩獲麟，曰：「吾道窮矣。」故因史記作《春秋》，以當王法，以辭微而指博，後世學者多錄焉。

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說：

桀、紂失其道而湯、武作，周失其道而《春秋》作。

這些資料表明，在司馬遷心目中，孔子作《春秋》絕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小事，而是發生在春秋末年一個劃時代的

² 司馬遷《史記》，中華書局 1959 年 9 月出版。本書所徵引的《史記》文字均出自該版本。

³ 據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，孔子適周問禮是在三十歲之前，此處說孔子是在周遊列國之後適周觀史記而作《春秋》，與《孔子世家》的記載自相矛盾。

重大事件，在中國歷史文化發展進程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，其價值可以與湯武革命相提並論。《春秋》作於孔子暮年，它是孔子在現實政治中的奮鬥失敗之後，為確立自己名聲、自見於後世的著作。《春秋》在形式上筆削嚴謹，辭約指博，字裏行間蘊含了許多孔子制定的「義法」。《春秋》運用褒貶手段評價歷史和現實，以此達到「使亂臣賊子懼」的目的；更重要的是，《春秋》為後代聖王制定了一王之法，《春秋》的「王法」施行之日，就是王道社會的重建之時。總之，《春秋》是凝聚孔子心血、寄託孔子一生理想的力作，是知孔罪孔的唯一依據。

孔子《春秋》的意義是如此重大，而司馬氏父子著述《史記》（當時叫《太史公書》）的宗旨，就是要上繼孔子《春秋》。這個學術宗旨最初是由司馬談確定的，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載司馬談遺囑說：

幽、厲之後，王道缺，禮樂廢，孔子修舊起廢，論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作《春秋》，則學者至今則之。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，而諸侯相兼，史記放絕。今漢興，海內一統，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，余為太史而弗論載，廢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懼焉，汝其念哉！

同篇又載司馬遷自白：

先人有言：「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，正《易傳》，繼《春秋》，本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之際？」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讓焉。

對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的這些記載，可以作多層次的解讀：首先，司馬談心目中的《太史公書》是要從孔子《春秋》絕筆的哀之獲麟寫起，以展現王道文化傳統由中斷到接續再到中興的歷史過程，論載在這個過程中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輝煌業績——這是從歷史學的意義上而言的；⁴其次，司馬氏父子決心通過述史來繼承孔子刪述六經的事業，用司馬遷自己的話說，就是「厥協六經異傳」，也就是要將孔子在六經異傳中所寄寓的王道文化傳統繼承下來——這是從文化學術的意義上而言的；再次，司馬氏父子希望自己的《太史公書》能夠取得像孔子《春秋》一樣的政治學術價值，能夠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王之法，他們能夠通過著述《太史公書》而獲得像周公、孔子一樣的文化巨人的地位——這是從政治意義而言的。無論在哪一個層次上，孔子《春秋》都是《太史公書》著述的光輝典範，都是司馬氏父子所取法的最高楷模。司馬氏父子是將《史記》定位在孔子《春秋》的文化傳統之上，《史記》全部的學術思想，司馬氏父子的全部人生期望值，司馬遷所有的政治藍圖，都建立在孔子作《春秋》說這個觀點之上，他對一部中國通史的認識和評價，都與他對孔子的理解密切相關。孔子作《春秋》說對《史記》著述的影響，無論怎樣估計也不為過高。

二、孔子作《春秋》說的歷史文化考察

司馬遷將孔子作《春秋》視為中國歷史文化發展史上里

⁴ 從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的記載來看，司馬談原來心目中的《太史公書》在時間上是上接孔子《春秋》的。後來司馬遷擴大了史書寫作規模，將《太史公書》寫成一部上自黃帝下訖當代的中國通史。

程碑式的重大事件，戰國秦漢時代的人們對孔子作《春秋》說也都深信不疑。一個極為有趣的現象是：漢人所理解的孔子就是那個刪述六經的孔子，就是那個作《春秋》當一王之法的孔子，《春秋》被人們看作是孔子思想學說的經典代表作，而真實記載孔子言行的《論語》，反而被漢人看成是解釋《春秋》經典的傳記。⁵

但是我們要問：《春秋》真的是孔子的著作嗎？《春秋》中真的暗含著孔子為漢家制定的一王之法嗎？秦漢六朝人們還不敢提出這樣的問題。但自唐宋之後，孔子作《春秋》的疑點就不斷被人們揭示出來。例如孔穎達在《春秋左傳注疏》中說：「推尋經文，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，閔公以下皆書氏，亦足以明時史之同異，非仲尼所皆貶也。」⁶這是說《春秋》中保留了眾多史官的筆法，而不是孔子一人的褒貶。趙汭、陸粲等人徵引商周金文，認為傳世商周彝器銘文中標年月日時都有「王」字，「王正月」並不是孔子的特筆，其中亦無特別的深意。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引鄭樵語云：「以《春秋》為褒貶者，亂《春秋》者也。」這分明是反對以《春秋》作為評價事物的標準。《經義考》又引朱熹語云：「聖人作《春秋》，不過直書其事，善惡自見。」按照此說，《春秋公羊傳》和《春秋穀梁傳》所闡發的那麼多的《春秋》微言大義都不是孔子的原意，而是後來的儒生們附加給《春秋》的。《經義考》還引劉克莊的話說：「《春秋》，史克之舊文也。」將《春秋》視為史克之

⁵ 《史記·李將軍列傳》載太史公曰：「傳曰：『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』」此語出於《論語》，可見司馬遷將《論語》視為「傳」。《漢書·揚雄傳》亦有傳莫大於《論語》之說。

⁶ 孔穎達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，第84頁。

舊文，這簡直就是在剝奪孔子的著作權了。石韞玉在《獨學廬初稿·春秋論》中說：「《春秋》者，魯史之舊文也。《春秋》總十二公之事，歷二百四十年之久，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。此數十人者，家自爲師，人自爲學，則其書法，豈能盡同？」石氏把《春秋》看作是幾十位魯國史官的共同作品，而不是視爲孔子精心製作的一王之法。中國封建時代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就不相信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將《春秋》譏之爲斷爛朝報。近人則多從思想、書法體例的矛盾來說明孔子未作《春秋》。例如馮友蘭先生在《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》一文中指出，《左傳·宣公二年》載晉太史董狐書趙盾弑君，《左傳·襄公二十五年》載齊太史及南史氏書崔杼弑君，這說明春秋時期的史官都在履行「使亂臣賊子懼」的職責，《春秋》之「義」也就是晉國《乘》、楚國《檮杌》之「義」。又《國語·楚語上》載申叔時之語：「教之《春秋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，以戒勸其心。」這說明早在孔子之前，《春秋》就已經成爲教人的一種課本。⁷ 近人楊伯峻先生也力主孔子不作《春秋》，他列舉了許多理由。例如，《公羊經》和《穀梁經》都在襄公二十一年（西元前 522 年）載：「庚子，孔子生。」《左氏經》於哀公十六年（西元前 479 年）載：「夏四月己丑，孔丘卒。」這一生一死顯然不可能出於孔子之手。在所謂書法體例上，《春秋》也有諸多不統一之處。例如，隱、桓公時，非魯國之卿大夫無論盟會、征伐都不寫卿大夫之名，莊公二十二年《春秋》書「及齊高傒盟於防」，這是和外國卿結盟寫出他姓名的開

⁷ 參見馮友蘭《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》，收入《古史辨》第二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出版，第 95-104 頁。

始。文公八年《春秋》載：「公子遂會晉大夫趙盾於衡雍」，這是魯國卿大夫與魯國以外的卿大夫會盟時都寫上姓名的開始。隱公、桓公、莊公、閔公四公時，外國卿大夫統軍出外征伐，都只稱「某人」，到僖公十五年（西元前 645 年）才寫「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」，還不寫出大夫的姓名，到文公三年（西元前 624 年）才寫「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」。又如在僖公以前，《春秋》多稱國君為某人而不稱某侯，僖公以後，僅秦楚兩國之君有時稱「秦人」、「楚人」，宣公五年（西元前 604 年）以後，始稱秦楚兩國之君為「秦伯」、「楚子」。⁸ 如果《春秋》是孔子之作，那麼這些書法不統一的地方就是不可思議的事情。楊伯峻還在《春秋左傳注·前言》中進一步徵引《春秋公羊傳·昭公十二年》的記載：「十有二年春，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。伯于陽者何？公子陽生也。子曰：『我乃知之矣。』在側者曰：『子苟知之，何以不革？』曰：『如爾所不知何？』」據何休注，文中的這個「子」就是孔子，這一年孔子二十三歲。依孔子之意，此處的「伯于陽」應作「公子陽生」。孔子明知史文有誤而不予訂正，這正說明孔子未作《春秋》。楊伯峻還舉出了一些其他論據，此處不再一一論列。他認為孔子未作《春秋》，孔子只不過是用魯國《春秋》教授過弟子。⁹

從古今學者列舉的這些論據來看，孔子作《春秋》說確實存在不少問題。今天除了少數學者恪守漢人之說以外，絕大多數人已經不再相信孔子作《春秋》了。如果我們不是局

⁸ 楊伯峻文章收入《經書淺談》，中華書局 1984 年出版。

⁹ 參見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·前言》，中華書局 1981 年 3 月出版。